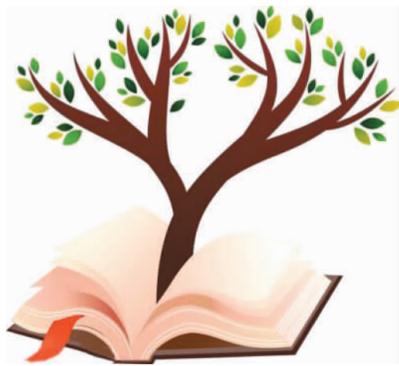


◎文学聚焦

每年几千部的长篇小说出版，能够活在读者心中的人物却少之又少——

当下文坛要有塑造典型人物的追求

贺绍俊



记得最早学习文学理论，记住了小说有三个要素：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其中又以人物为最重要。尽管后来的现代小说观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充满了颠覆性，现代派的小说家也完全可以不按人们公认的小说样式来写小说，但我始终觉得人物这个要素对小说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常常会引用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文学即人学”，其实就是说文学是观察人、研究人和书写人的。半个多世纪前，我国文学理论家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强调文学必须通过人来反映现实和时代，来表达价值评判。他说：“除非作家写不出真正的人来，假如写出了真正的人，就必然也写出了这个人所生活的时代、社会和当时的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但作家应该不仅仅满足于在小说中以人为中心，把人物写活，而且还应该立下更高的文学目标，这就是要写出典型人物。典型人物是指小说中具有代表性人物的个性特征。黑格尔说：“一个艺术家的地位愈高，他就愈深刻地表现出心情和灵魂的深度。”我以为，黑格尔所说的“心情和灵魂的深度”往往聚焦于小说的典型人物身上，作家的表现越是具有深刻性，所塑造的人物便越是具有典型性。

优秀小说提供新典型人物形象

近20年来作家们在对待典型人物的态度上似乎出现一些反复。比如在新写实的潮流中，作家们为了摆脱宏大主题的约束，便强调写“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写碌碌无为的小人物，虽然他们的小说也生动地描摹出众生相，但显然缺乏能够体现作者对于生活深刻见解的典型人物。不过应该承认，从主流倾向来看，作家们仍然看重对典型人物的塑造，一些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优秀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典型人物形象。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其成功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就因为作者精心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白嘉轩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个乡绅的典型形象。中国乡村现实的文化贫瘠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社会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失。陈忠实也写出了一个乡绅在社会衰败期的复杂性格，他丝毫不掩饰乡绅在

原始积累上的罪孽，写白嘉轩若没有种植罂粟的经历，就难以从众多普通农民中脱颖而出。但他更强调了白嘉轩在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写他遵循着儒家的“仁义”，恪守着“学为好人”的信仰，让我们看到白嘉轩在道德上的操守和践行，其实就是为当地开通了一条文化泉水流淌的渠道。当然，在白嘉轩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我们也看到了作者陈忠实的“心情和灵魂的深度”，这是对中国文化传统重新认识的深度。

塑造引领时代潮流的英雄形象

英雄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典型人物中的典型。自从人类开始自己的文明进程，英雄便始终成为一面旗帜，一种动力，鼓舞着人类的进取心，所以有人说，英雄的形象就意味着人类向往更完美的精神发展。但也许正是由于英雄形象在思想内涵上的标高，决定了要塑造出成功的英雄人物形象非常不容易。加之我们过去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因此就带来一个尴尬的后果：作家重点塑造的英雄形象或正面形象不成功，反而是本来是作为英雄形象陪衬的次要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作家们不能因为塑造英雄形象有难度而放弃这份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说，塑造出引领时代潮流的英雄形象，也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应该为这个时代担当起的一份责任。事实上，当代作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英雄，英雄形象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也会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是，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持之以恒景仰的一种精神，寓意着人类的理想，因而又具有一种超越性，因此在英雄形象身上能够看出这种超越性。不同时代的英雄在本质上具有许多不变的共性，比如说，献身精神便是英雄的一种基本精神。在这一方面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如何追求社会核心价值与人类普遍价值的辩证统一。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以一位革命烈士为原型，成功塑造了一个感人的英雄形象许子鹤。许子鹤这一形象不仅具有共产党人形象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阶级本色，而且亲切感人，充满智慧，情感丰沛。这一形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对英雄主义主题的深入发掘。一方面，他给主人公许子鹤确定了符合共产党人思想原则的中规中矩的底色：忠诚、信仰、使命、志向、责任感、牺牲精神；而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将共产党的核心价值与人类共同的价值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孝顺、爱情的忠诚、与人友善、古道热肠，等等。因此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写许子鹤对待父母特别是对待养母的感人故事，也妥善地写到了他与叶瑛的爱情婚姻以及他与德国姑娘劳妮娅的微妙的情感关系。这部作品也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系统与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之间具有密切的辩证关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充分体现对人类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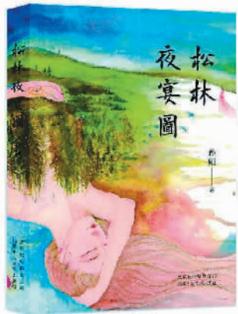
孙频的变奏

韩 起

回想着大历史，才更见每个个体生命的短暂与可贵。在评论家杨庆祥看来，孙频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远离她以前的个人化写作，在向更伟大的传统靠近。她不仅仅是写欲望驱使行动，还试图去分析这些欲望背后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作家张楚认为从《万兽之夜》到《光辉岁月》再到《松林夜宴图》，孙频的小说打开的视角增大了。同时孙频小说自身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也都在往更开阔或者说更自由的方向发展。作家梁鸿认为，《松林夜宴图》在混合了中国古典美学某种飘忽、阴柔、自我原凉

的特征以及某些阐释的、柔软的东西之后，外表看来棱角稍钝了一些，但骨子里更尖锐了。孙频一直关注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认知。她的小说，虽然大多从女性视角进入，但里面却有一个内在的宽阔性。孙频说，随着年岁、经历、感悟各方面的增加，对世界的认识、趣味、审美会不自觉慢慢发生改变，“从我早期小说中那种感性的、被人物的情感驱动着向前推进的内在逻辑，到这两年我开始在写作中刻意增加理性的成分，这就是变化。因为我慢慢觉得作为一个作家，当她不具备理性的时候，她肯定会失去一些思考的纵深

度和宽阔度。这也是我的小说在近年来呈现出的一些发展变化，我在试图增加一些文字背后的思考，比如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人物的心理机制、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等等。而每一点微小的进步对作家来说才是写作中真正的喜悦。”



孙频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西文化深度融合的长篇佳构

——读《白鹤山庄》

何镇邦

夏雨雪是一位在美国拼搏多年的企业家。她不仅在事业上成就斐然，且在中西文化的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十几年前，她就动笔撰写一部既反映她在美的创业经历又融合中西文化的长篇小说。经过10年努力，数易其稿，她的长篇处女作《白鹤山庄》终于2016年7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两年来，这部作品虽在海内外的华文读者中具有相当强烈的反响，但由于作者的低调姿态和有关方面宣传力度不够，它的知名度同它所具有的社会认识价值以及审美价值不相适应。20多年来，我对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尤其是北美的华文文学创作有所关注，窃以为，无论是就反映新移民生活的深度来说，还是就中西文化融合的深度来说，《白鹤山庄》都是一部值得重视的长篇佳构。

世纪初，出于人性中的贪欲而争夺财富的扑朔迷离的故事。这故事既有传奇色彩和神秘色彩，又有刀光剑影和血腥味，具有相当的人性深度。白鹤山庄原是一个阿拉伯亲王的行宫。“9·11”后，阿拉伯亲王猝死于突发的心脏病，其王妃将山庄出售，被华人富商野风购得。野风一家人住山庄半年，怪事迭出：野风寄以厚望的赛马天使之翼神秘失踪，骑师阿尔法失语，凡此种种，均引起山庄的惊恐不安。野风的发小莫名受遣来到山庄，追查发生的案件，着手训练参赛的雪山飞龙。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庄里外发生的案件一一水落石出。山庄管家白杰瑞自杀身亡，野风、莫名、南天月在白鹤楼上举枪对决，故事推至高潮。山庄帮佣、白管家的情妇兰妹子在白杰瑞死后，获得南天月赠予的重金，带着孩子回到四川，曲终奏雅，篇末这一笔似又闪烁着人性温暖的光辉。回

看整部小说，故事讲得一波三折，仅此一点，就够吸引人的了！小说所写的人物不多，也有若干可圈可点之处。白鹤山庄的主人野风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心思如发，诡计多端，刻画得相当成功。野风的母亲奚老太太着墨不多却更为典型。她控制欲满满，说话尖酸刻薄，活像个当今的“西太后”。小说的第5节，写奚老太太在白鹤楼主持欢迎莫名的豪华晚宴，几笔就把她写活了。山庄的管家白杰瑞是一个表面善于奉承并卑膝谦恭背后又善搞阴谋诡计的小人，这个人物形象也刻画得相当成功。莫名和南天月是小说中笔墨最多的两个人物，一个善于周旋，一个善良并略显温婉，都相当鲜活，但就艺术质量而言，均逊于上述三者。一部长篇小说，有了相当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有特色的叙述技巧，有了对社

◎作家谈



看家本领不能丢

张 陵

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正在成为热门话题。那么多好作品，那么多好作家，成就怎么讲都不为过。有成就当然也会有不足。老派一点的评论家时常会在当代小说人物画廊里数来数去，看看这40年里，有多少小说人物被放进去，有多少人物我们还记得。这一数不要紧，就把短板给露出来了。

刘心武《班主任》中的谢惠敏，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陈忠实《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陈世旭《小镇上的将军》中的将军，张贤亮《绿化树》中的章永璘，陆文夫《美食家》中的朱自冶，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柯云路《新星》中的李向南，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梁三喜，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都可以说挺立在当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往下数当然还可以再数出一些。而有数据表明，我们每年要生产数千部长篇小说以及数量更多的中短篇小说。这一比，能发现小说作品数量与小说人物数量严重失衡问题。

我们很容易就会接着发现，这些人物形象，大部分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小说家们塑造的，越往后，小说数量越多，人物形象越挺不起来。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们甚至找不到像样的小说人物。

小说是讲故事，出人物。评价一部小说，很多时候并不看小说家想的说的多深刻，而看写的人物是不是有血有肉，是不是个性突出，性格典型。形象总是大于思想。人物形象塑造可能是小说艺术的最低要求，也是小说艺术的最高追求。

小说作品多、人物缺的原因固然可以列出许多条。从小说艺术规律看，至少有几条是根本：其一，文学的基本关系出现了困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实生活如火如荼，但文学特别是小说与生活关系的途径并没有更大的拓宽，反而越来越窄，越来越远，越来越生疏。小说家走不进人民的生活，自然找不到现实生活的新人物。其二，小说家逐渐放弃了“写实”的追求，过于依赖所谓的“第一人称”，也就丧失了表现“他者”的能力。没有了真实的生活，看上去是在写人，其实人物个性不鲜活，性格品质也不高，表现的都是“自我”。其三，理论评论的严重误导。这些年，理论评论过于鼓吹“现代派”理论，过于强调无主题、无故事、无人物的“三无”理念，对小说写作有误导。与此同时，商业化的文学过于受宠，文学的价值和初心淡漠了。

找回小说人物，是小说补短板的当务之急。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小说家们沉下心，到现实生活中去找。塑造时代的人物形象，是中国文学的看家本领，什么时候都不要丢。

专家研讨王彬叙事理论

杨 鸥

由鲁迅文学院、人民出版社主办的王彬叙事理论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王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水浒的酒店》《红楼梦叙事》《无边的风月》《从文本到叙事》4部叙事学专著，涉及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探讨了中西小说中的叙事规律与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叙事理论，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与当下小说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支撑和依据。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明指出，王彬的叙事理论研究很扎实，依据中国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和国外的传统与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做理论上的总结，不仅对小说，对散文、诗歌叙事都有研究，而且将理论与当代的创作实践相结合，既有理论的根基，又和作家的创作需求对应起来，对创作者有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生命力和说服力。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认为，王彬的叙事学理论开拓了一个新领域，对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有自己创造性的转化，将它中国化，有自己个人的叙事学理论建构，并从叙事学方面提升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境界，其理论的运用和对象把握的结合对我们有启示。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认为，王彬用西方新潮理论研究中国小说，有一种理论上的雄心，将中国文本找到一种世界通解的可能，产生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他有学术的储备，阅读的准备，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梳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内部奥秘的思考形成自己的理论。对当代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性。

王彬谈到，叙事研究一方面要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同时也要融通西学，只有站在中西学术的节点上，才能创建本土话语体系。